

深改元年

与经济智囊对话

吴锦才 / 主编



中國經濟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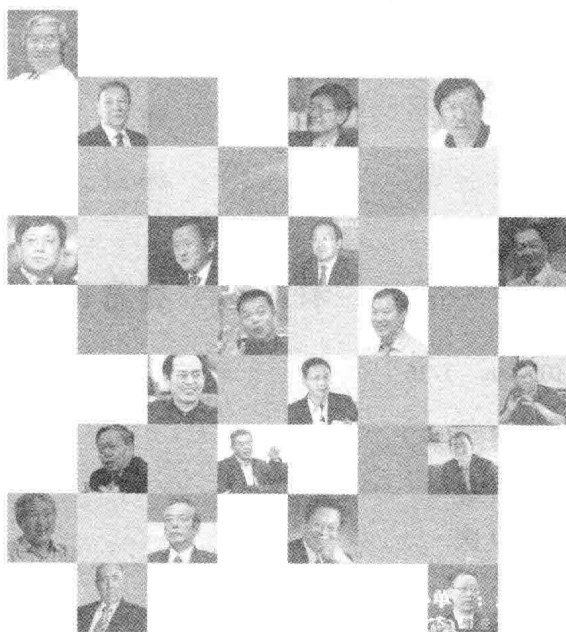
SHENGAI
YUANNIAN

中国证券报

深改元年

与经济智囊对话

吴锦才 /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改元年: 与经济智囊对话 / 吴锦才主编.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5. 3

(中国证券报资源库)

ISBN 978 - 7 - 5136 - 3744 - 2

I. ①深… II. ①吴… III. ①经济学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5. 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6925 号



责任编辑 乔卫兵 崔清北 黄静

责任审读 贺静

责任印制 马小宾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19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

定价 48.00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 8179 号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5416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88386794

《深改元年：与经济智囊对话》

主 编：吴锦才

编 委 会：吴锦才 王 坚 段国选 马忠志
 闻召林 冯 刚 孔雪松 孙 伶
 陆明丽 上官卫国 翁俊山 张德斌
 王栋琳 于 力 黄俊峰 杜雅文

执行编辑：胡东林 刘国锋 廖 维

序言一

寻找改革红利

由于研究资源和政策资源都是稀缺资源，将其配置到哪个方向，无疑应该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说过一句话：需要一堆“哈伯格三角”才能填满一个“奥肯缺口”。这里讲到的两个经济学概念，前者指因垄断、价格扭曲等体制因素造成的福利损失，后者指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能力的幅度。托宾这句话的意思是关注宏观经济问题，比关注体制问题更加有意义。

在关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争论中，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增长减速原因是需求不足，因此，通过加大投资可以预期的增长潜力可达8%。这与另外一些学者从供给方预测的潜在增长率相比，判断相差接近2个百分点，按照中国目前超过62万亿元的GDP总量计，这种不同判断意味着每年有超过1万亿元GDP的差别，即所谓“万亿元之争”。

如果中国经济的确是在潜在增长能力之下增长，研究如何填满“奥肯缺口”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由于体制障碍造成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如何通过深化改革予以解决。根据我的测算，通过改革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生产率和均衡人口发展，可以产生的提高潜在增长率效果，也可以高达未来GDP总量的1到2个百分点，可见改革红利也颇为不费。

无疑，供给方和需求方因素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因此，理论上说政策可以从两个方面发力，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例如，更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和更快增长的生产率，都可以通过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在消费者预算不变的条件下提高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实现“萨伊定律”所谓的供给创

造需求。另一方面，消费者收入增长可以使原来消费不起的产品数量成为可行，基础设施等投资也可以转化为企业的供给能力。不过，需求转化为供给是有约束条件的。首先，消费需求转化为供给能力的前提是封闭经济，即在不考虑进口产品竞争的情况下。如果国外竞争者仍然可以提供更为价廉物美的产品，则这个消费需求的扩大还不能转化为潜在增长率。其次，投资需求转化为供给能力的前提是不存在产能过剩。在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许多产业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投资需求扩大只能诱导出更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不是潜在增长能力的提高。

本书收集中国证券报自2014年一季度起策划并推出的“对话改革”系列稿件，一系列专家分别从宏观经济和体制改革不同角度，探索稳定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全面深化改革等问题，有助于广大读者分辨当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哪些属于“哈伯格三角”问题，哪些属于“奥肯缺口”，进而了解深化改革的主要方向和关键领域，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趋势与进展。

蔡 昉^①

2015年3月3日

^① 本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蔡昉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序言二

凝聚改革年代的共识

经过中国证券报和中国经济出版社的共同努力，《深改元年：与经济智囊对话》今天出版了。

置身于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伟大时代，我们谨以此书，向这个时代致敬。

近几十年来，中国财富的积累速率与改革的步伐一直呈现正相关。2014 年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深化改革元年。在这个年代，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不亚于 1978 年那个时候。而且，在这个年代我们财富积累的路径对改革的依赖更大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正是从我国现时期的社会存在即社会物质的总和出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站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围绕着深化改革，不断爬坡过坎、攻坚克难、敢破敢立、敢创敢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系列具有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的改革措施密集推出，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坚冰正在被打破，一场深刻变革正在中华大地孕育迸发。

身处这一伟大的变革时代，我们心潮澎湃，责任倍增。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权威主流媒体，为改革鼓与呼、为投资者寻找有效信息，这既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也是不可推卸的现实义务和历史责任。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推进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我们认识到：在现今的财经报道中，加强宏

观思维的任务，从未有如此迫切。因此，《中国证券报》自2014年一季度起，开始策划并推出“对话改革”的系列报道，邀请张卓元、张晓山、郑新立、韩俊、刘世锦、余永定、樊纲、刘胜军、胡鞍钢、周其仁、贾康、季晓南、蔡昉、迟福林、刘迎秋、李扬、温铁军、王一鸣以及华生、常修泽、李罗力等资深专家就改革热点问题和读者分享他们的思考 and 智慧成果。这其中，既有阳春白雪式的政府改革、经济增长乃至新常态等主题讨论，也不乏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征地制度改革等现实问题的探讨。我们期待，借由这样系统而专业的互动报道，帮助投资者从宏观角度去认识事物发展的趋势、把握投资主线，从而强化中证报的专业品牌形象；同时也寄望于以自身的绵薄之力，有助于人们了解改革、支持改革、凝聚共识，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正能量。

深化改革大潮奔涌而来，媒体虽为沧海一粟，同样面临涤荡考验。因改革而生的《中国证券报》，创刊二十余年来恪守“可信赖的投资顾问”宗旨，客观、中立是从未动摇过的立场。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直面新的机遇与挑战，更加贴近读者、贴近市场，用更多、更好、更全面、更及时的专业报道来回答读者关心的话题。我们也将继续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前瞻报道力度的同时，创新形式、拓展领域，围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资产证券化等重大主题加大调研力度，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多样而系统的专业报道。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顶层设计勾勒出的蓝图，必将使中国经济发展更添后劲，也让坚持依托实体、服务产业的中国资本市场更具生机和活力。在当今改革高奏进行时的时代，《中国证券报》将一如既往地改革呐喊、为资本市场加油。

深改只是开始，精彩尚在后头。《中国证券报》与您相约，继续见证。

吴锦才^①

2015年3月8日

^① 吴锦才为现任中国证券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目 录

序言一 寻找改革红利	(1)
序言二 凝聚改革年代的共识	(1)

对话改革篇

张卓元：当前经济改革重点是政府改革	(3)
张晓山：发展合作经济 斩除农村金融乱象	(11)
郑新立：稳增长改革投融资体制立竿见影	(20)
韩俊：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	(28)
刘世锦：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政府重新定位	(35)
余永定：中国近期发生金融危机可能性不大	(44)
莫干山会议亲历者：平衡三大关系 改革再闯关	(53)
樊纲：“十三五” GDP 年增速可望不低于 7%	(63)
刘胜军：定向降准不宜长期实施	(72)
胡鞍钢：建设有为有效政府 激发全民创新活力	(81)
周其仁：改革不应自我设限	(89)
贾康：财税改革亮点纷呈 财政政策可更积极	(98)
季晓南：应抓紧制定发展混合经济中的“负面清单”	(106)

蔡昉：建立成本分担机制 冲破既得利益藩篱 (114)

迟福林：加快服务业开放是市场化改革最重要任务 (122)

刘迎秋：全面降准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131)

李扬：新常态下经济面临六大挑战 (138)

温铁军：建设综合性合作社 推进农业三产化 (146)

王一鸣：以改革和创新培育中国经济新动力 (156)

智囊人物篇

李扬：做学问永不退休 (165)

华生：骨子里我是一个叛逆的人 (173)

贾康和他的人生“三部曲” (184)

家国往事：张卓元的 1991 (192)

胜军面对面 (203)

对话改革篇

张卓元：当前经济改革重点是政府改革

中国证券报记者 胡东林 倪铭娅

张卓元，1933年7月生，广东省梅县人。1954年9月到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先后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83年7月调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任所长，1993年12月调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所长。1995年9月—1998年10月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价格学以及市场学。



主要社会兼职：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价格学（协）会顾问，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

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著作奖。2013年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自十四届三中全会起至十八届三中全会，共十余次参与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中国的价格改革推进到当前一步，很多领域要付的成本就是用钱来‘买’机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张卓元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现在经济改革的重点是政府改革，而稳中求进的关键点则是稳增长、稳物价。此外，当前的经济下行可谓是2004—2007年经济过热和2009年刺激过度的一种自发式平衡，结合改革的大背景和“稳中求进”总体精神，经济增长的容忍度设为7%左右并无问题。

稳物价是关键 经济增速7%左右无碍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2014年一季度的经济下行压力，接下来是否可以考虑出台稳增长措施？

张卓元：当前出现的经济下行是预期中的。我们知道，2004—2007年经济一直过热，2009年又刺激过度，然而在经济大起之后一直没有大落来平衡，最多只是增速稍微放缓，这纠正不了原有的问题。导致的结果是，“中病”没有治好，一下转为慢性病。

因此，从纠正过去问题的角度看，经济下行是必然，将经济增长的容忍度设为7%左右并无问题。如果此时采取某些保增长措施，一定要避免重走老路，不能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必须避免大量注水扩大投资等。

但据我了解，现在有的地方仍在不断批项目，增加投资，然后以银行信贷来支撑，这无非是把矛盾后移，令人担心。

中国证券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提了多年，难点在哪？

张卓元：转方式“转而不转”困局的主因在于体制和机制。我们知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实现由主要依靠资金和自然资源支撑的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支撑的经济

增长转变，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型经济转变。这么好的理念为何难以推进？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现行财税、价格等体制，刺激各地热衷于工业立市和外延式经济扩张。具体表现在于，一是政府用行政权力廉价获得农民土地；二是水资源浪费严重；三是能源价格低廉；四是矿产品价格低廉。正是这种资源价格低、环境约束差的格局，使得各地政府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证券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增长的定调让我们似曾相识。1987 年你就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如何理解二者的异同？

张卓元：“稳中求进”的含义更宽了，过去指的是改革发展，现在则包括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含义。这很好理解，只有社会稳定了，才能做其他事情。经济要稳中求进，社会更要稳中求进。也可以这么说，经济稳中求进是社会稳中求进的基础，社会稳中求进则是经济稳中求进的前提，经济稳中求进的关键点则是稳物价。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价格改革与通胀间的关系？如今的影子银行和热钱等，在以往要么不存在，要么影响甚微，和以往比，我们管理通胀的思路应有何转变？

张卓元：相对于低生活水平来说，要理顺价格，必然会抬升价格。因此，价格改革带来的涨价对通胀会有影响，但政府可以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发放补贴的方式减少影响。

价格改革与通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根据我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估算，若物价上涨超过两位数，其主要是受货币发行因素影响；若物价上涨在百分之五六以下，则更可能受理顺价格关系的因素影响，且这一影响对物价上涨的贡献大概在 3% 左右。当然，现在情况较之以往有了很多变化，有兴趣者不妨去做一下类似的研究。

管理通胀的新思路事实上已经体现，那就是调控决策部门不能光看金融业表内业务，也要看表外业务。可能更能说明情况的指标是社会融资总量，而非新增贷款额。

中国证券报：以前你曾主张6%左右通胀率和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较好的结合点，现在呢？

张卓元：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环境已发生数个方面变化：一是中国经济整体块头大了，批一两个项目对经济拉动根本不起效果，过去改革的红利、人口的红利很多，而且过去可以低成本扩张、环境污染，现在都不现实了；二是过去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和能源价格都很低，商品出口很大程度是低价倾销的结果，现在也都不可能了。

现在来看，3%左右的物价上涨率、7%左右的经济增速可以接受，也有望维持一段时间，因为现在我们还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当然，未来随着经济发展体量的增大，经济增速难免下滑，此时3%的通胀率就稍显偏高了。

资源品价改是突破口 应更加注重节约导向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价格改革的现实意义，其突破口在哪里？

张卓元：必须看到，我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和服务价格绝大部分已经放开由市场调节。与此同时，一些生产要素和重要商品特别是资源性商品的价格仍受政府管制，而且长期以来价格偏低。水价低、能源价格低、资金价格低、污染环境不付费等，实际上鼓励粗放扩张，使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要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这也说明，深化价格改革，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仍具有重大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实践中，深化价格改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以往看，虽然从理论上原则上认识到理顺价格关系最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但一碰到一些具体困难，或牵涉到局部利益受损时，又常常把理顺价格关系放在一边，满足于保障眼前的短期效益。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2005年、2006年CPI较低时没有及时调整那些严重偏低的资源产品价格，丧失了难得的机遇。事实上，这只是把矛盾往后移甚至积重难返。

目前，从价格改革的几大领域看，要素价格改革正在推进，比如利率市场化，又比如 95% 的商品价格和劳务价格都已放开，这些领域的改革基本顺利，因此，价格改革的突破口就在于资源品价格改革，这甚至比要素价格改革还迫切、还重要。

中国证券报：说到能源，你对天然气价格改革的方案是否满意？

张卓元：节约能源，价格杠杆是最有效的办法。根据世行专家量化估算，价格因素对能源节约的贡献度可以达到 55%。包括水、电、气在内的一些群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资源品价格，利用价格杠杆达到节约资源的效果最好，但在使用价格工具时要慎重。

用阶梯计价的办法保基本，必须拿捏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体现资源稀缺性之间的一个“度”。例如，将水价提高至六到七元每吨，然后给困难群众发放专项补贴，这个办法可能比较有效，但会增加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但从节约资源角度来说，是比较有效的方法。我认为，价格政策应根据国情而更多地倾向鼓励节约，这也有望成为改革的方向。

对于天然气，一个基本现实是我国的消费约 30% 靠进口，且进口依存度还将逐渐提高。目前进口天然气价格大概是 3.5 元/立方米，根据阶梯气价计价，第一档是 2.28 元/立方，第二档是 1.2 倍，第三档是 1.5 倍，第三档才接近进口价格。应当说，这个档次拉得并不够，这对节约能源不利。我认为，第二、三档差距可以再大些，第三档完全是高消费，可以超过 3.5 元/立方米，以后应该这么改。

中国证券报：价格改革逐步推进，难以绕开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如何规避由此带来的风险？

张卓元：价格是否与国际市场挂钩要根据依存度来决定。依存度高的，不挂钩也不行；依存度低的，视情况而定。战略性物资和牵连到农民利益的农产品要慎重。比如原油、大豆对外依存度高需要与国际市场挂钩，汽油价格也需要根据一定的机制动态调整。主粮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就不能和国外挂钩，要实行重点保护价。日本就采取了这样的价格保护，自己国内的农产品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很多。